



中外传播思想史  
黄旦 主编

# 欧洲传播思想史

李 彬 曹书乐 等著

A History of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中外传播思想史  
黄旦 主编

# 欧洲传播思想史

李 彬 曹书乐 等著

A History *of*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传播思想史/李彬,曹书乐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ISBN 978-7-309-11626-7

I. 欧… II. ①李…②曹… III. 传播学-思想史-欧洲 IV. G20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598 号

欧洲传播思想史

李彬 曹书乐 等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66 千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26-7/G·1492

定价:56.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

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传播思想史”终告完成,各卷书稿将陆续出版。

从项目申报到今天出版,经历了一个很是漫长的过程。当然,这主要是我这个项目负责人没有当好。现在想来,集体合作项目,需要抓住时机一气呵成,如果时松时紧,每个人手头事情又多,就很难再凝聚气势和力量。时间一长,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拿这个课题来说,期间参与人员就换了好几拨。好在经过同道们的坚持努力,总算圆满结项。于我而言,真是如释重负。在此,首先对项目组的所有成员表示由衷感谢。

项目启动时,曾就其基本构架有过几番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时间为线索,按照传播思想的重要变化划分其阶段,由此推究展示其演变轨迹;二是以专题形式,辅之以一定的时间线索,也就是大致是按先后出现的相关传播思想的一些主要论题而展开。经过大家再三讨论,最后达成共识是采纳后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整个项目跨度大,涉及面广,试图在全面把握中理出其内在的历史变化逻辑线索,并且做到每一个变化的节点都拿捏准确,且不说学识和能力,就材料的阅读整理分析归并,工作量也是太大。现在来看,这个选择还是明智的。专题形式比较灵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深或浅,或断或续,可以依据问题相应处理。专题形式的关键,在于论题的选择以及阐释。论题不仅要选得合适,而且还要涵盖和体现传播思想变化中的重要问题,这很见功力和学识。当然,专题式的短处也是一目了然,比如各个论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显得不够紧密,思想变化的历史环节也不易得到一一展现。学术研究总是量力而行,难以面面兼顾,我们目前所取之写法,其遗漏和遮蔽在所难免,更谈不上完美,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记得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说过这样的话:“传播学概念提出的问题和传播现象本身一样多,各种概念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与其他理论定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统一。”<sup>①</sup>克瑞格的《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一文,也正是从

<sup>①</sup> 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2页。

这样的面向,比较分析了传播研究各种路径及其对传播的认定,并对之做了进一步展示和说明。所以有学者曾提出,传播与其说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概念的家族。这,也成为我们在研究中面临的一个很大困扰,即如何界定传播并贯穿在所有子课题之中。大家为此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感觉难以归于一统,比如欧洲与美国差别很大,无论是传播思想的来源、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都是如此。就大众传播研究的发源地美国而言,即便是按照詹姆斯·凯瑞从文化角度的最简约化划分,也有“传递观”和“仪式观”之别。凡此种种,要在“中外传播思想史”这样的项目中,圈定一个“传播”并以此为准,一方面很难,另一方面也给研究者造成诸多约束,更不必说可能会因名失义,反而模糊了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传播思想的各自特点。于此,最终决定由各子课题负责人根据自己研究的具体语境处理,不再坚持一个统一的标准概念。此种颇有后现代意味的多元化,解放了各个子课题的手脚,以便更加贴近历史实际,但显而易见,也会带来各自的差异性:框架体例,突出的重点,叙述线索,甚至行文风格,均不统一。好在各卷本来就是合可一体,分则独立,倒也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影响。现在想来,当时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即不是去找一个原点式的概念,而是把“传播”重新概念化,赋予其不同层面的含义,这样既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同时又不至散漫。现在说这话当然是马后炮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事后聪明虽然留有遗憾,或许可以为后来者做“亡羊补牢”之助。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思想史的研究是难度很高的一个领域。抛开研究者必需的综合知识学养、锐利的历史辨析眼光、纵横交错的总体把握能力等不谈,“思想”本身的理解及其呈现和如何呈现,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里不是展开充分讨论这些问题的合适场所,挑最简单的,“思想”的厘定及具与观念、学术研究、知识等关系的处理,就是首要的难题。其次,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密不可分,没有离开实践的光秃秃的“思想”,“思想”一定以实践为依托,是实践问题在“思想”层面的呈现,但实践毕竟不是思想也不能取代思想。恰如有学者所言,“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思想史研究,这是当代史学的主流思潮。不过,我们始终不应忘记的是,那是谁的问题?问题在现实情境中产生,人们需要通过重构历史来为现实中该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合理化论证。思想史研究同样如此。只有思想史家意识到他的研究并不只是呈现纯粹的观念层面或思想层面的精神交往现象,同时还应该依据不同的现实情境赋予观念或思想不同的意义,以便回答研究者认为出现在该情境中的问题,那么,理想的思想史研究就必定应该是内在与外在相融、内容与情境统一的研究。”<sup>①</sup>总而言之,传

<sup>①</sup> 陈新:《历史学的归宿:全球化情境下的思想史写作》,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177页;引见第165页。

播思想总是在具体传播实践及其场景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自然形成的思想史,因此,如何切割出“思想”,其依据是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传播思想研究者无法回避且又不能不时时自我警醒的问题。我在《传播思想/思想史的尺度》那个讲演<sup>①</sup>中,试图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既含有对同道们的期望,更多则是针对自己的反省和诘问。我们这个项目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贯彻这样的要求,并且大家也是为此而认真探索和努力,至于做得如何,则需要读者来评定。坦率说,由于各自的理解和把握不一,在这方面出现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肯定在所难免,非常迫切期待大家的批评。

项目设计申报时的状况与今天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别的不说,类似的研究及其成果,就远比过去多。我们是启动研究在前,成果形成在后,像一句俗语说的,“早开的航船晚靠岸”。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关注这种变化,并且也十分注意根据新的情况,做出各种调整,在展示研究最新进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成果不是要为已有的书作补充,相反,在研究的思路、框架的设置、材料文献的征用,分析概括的见解,都要追求显示自己的新意和特色,相信读者对此是有判断的。在此,我要再次向项目组的各位同仁表示深深谢意,是大家的辛勤和坚持,才有我们和读者一起分享成果的今天。

黄 旦

2016年8月

---

<sup>①</sup> 2016年3月27日,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问题域与关键词:传播革命时代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 目录

■ 绪论 .....	001
■ 第一章 欧洲传播研究概览 .....	005
第 1 节 传播学、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 .....	005
第 2 节 英国的传播研究 .....	013
第 3 节 法国的传播研究 .....	020
第 4 节 德国的传播研究 .....	025
■ 第二章 新闻自由与媒体规制 .....	035
第 1 节 自由观念与自由主义 .....	036
第 2 节 弥尔顿及其《论出版自由》 .....	038
第 3 节 理论：四类哲学话语 .....	041
第 4 节 实践：18 世纪的瑞典与美国 .....	043
第 5 节 从自由法规到媒体规制 .....	045
■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 .....	050
第 1 节 历史沿革与思想渊源 .....	050
第 2 节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	053
第 3 节 极权主义视野的大众文化 .....	056
第 4 节 文化工业、工具理性与启蒙辩证法 .....	058
第 5 节 灵光消逝、机械复制与传播新科技 .....	063
第 6 节 洛文塔尔及其人物传记研究 .....	067
第 7 节 单维社会的文化反叛 .....	074
第 8 节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遗产 .....	078

■ 第四章	从文化研究到新受众研究	081
第1节	两大起源	081
第2节	新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090
第3节	文化研究奠基人	094
第4节	三次理论转向	109
第5节	领导力/文化领导力理论	113
第6节	新受众研究	120
■ 第五章	媒体与民主	134
第1节	从第四权力到第四支柱	134
第2节	公共服务广播	135
第3节	信息社会、互联网与民主	137
第4节	另类媒体的理论与实践	142
第5节	自由与和平的民主悖论	146
■ 第六章	现代传播与文化身份	147
第1节	何为文化身份	148
第2节	媒介与性别	156
第3节	媒介与种族	164
第4节	媒介与阶级	168
第5节	媒介、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	173
■ 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	180
第1节	老问题,新认识	180
第2节	全球体验的文化路径	183
第3节	文化全球化:强理论与弱理论	185
第4节	文化帝国主义	187
第5节	全球传播新视野	206



■ 第八章 媒体·现代性·社会发展	216
第1节 现代性话题	216
第2节 现代传播与社会发展	223
第3节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227
第4节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242
■ 第九章 交往与对话	254
第1节 传播目的	256
第2节 从芝加哥学派到文化研究	261
第3节 回到 communication	266
第4节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277
第5节 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288
■ 结语 马克思的幽灵	296
■ 参考文献	315
■ 后记	333

## 绪 论

思想是经过思考得到的一种观念,一种看法,一种系统认识。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思想从现实中来又影响着现实。所以,马克思说得好,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思想史略对应于英文的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ideas/thoughts*; 本书主要关注学术界的思潮涌动,而不将生成于民间、流行于大众的相关观念纳入考量范畴。本书尝试建构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是欧洲学界围绕人类(而非欧洲)基本传播议题而展开的各种学术探究及其思想流变的历史,其中存在若干一以贯之的主线或潮流。

传播思想史是关于传播问题的思想变迁史。其中既包括直接关乎传播与媒介问题的理论,也包括有关媒介与社会,乃至更大语境的认识;既涉及传播研究领域,也涉及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虽然本书书名将大致研究范围限定在欧洲,或欧洲学者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特定地域,思想往往在全球范围内撞击、交融和重塑,因此本书内容也就不可避免地同非欧洲的传播研究以及思想理论相交织、相呼应。同时还应强调,欧洲传播思想史势必同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密不可分。

思想史写作的思路大致有两种。传统思路往往以思想家个体为线索,大致按从古至今的脉络一一阐述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晚近的思路则集中于探讨不同时代的特殊主题及其勾连。例如,北京大学唐士其教授的新作《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便以“政治与理性”“政治与伦理”“公民与共同体”等主题为纲,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揭示西方政治思想史繁复混杂的演进脉络。

本书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同时也适当采纳前一种思路。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包括思想史研究,贵在有问题意识、有历史脉络,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历史脉络的传播研究恰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充其量属于学术操练,甚至自娱自乐。本书拟以欧洲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及其相关议题为纲,缕析相关的学术思想及其成果,以求条理更加分明,同时更具思想的洞察力与历史的纵深感。这种“以议题为脉络”的思路,也给本书作者带来诸多挑战,如:既要准确把握历史的全局与逻辑

的线索,又要兼顾某一议题的连贯脉络;既要审视不同时段甚至不同语境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的断裂和转向,又要考虑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文献资料;等等。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将欧洲传播思想史的重要议题归纳如下:“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从文化研究到受众研究”“媒体与资本主义”“媒体与民主”“媒体与文化认同”“媒体与全球化”“媒体与现代性”等,并在这些议题下阐述各路学者的研究及其成果。另外,在研究和写作中,我们注重思想史的连贯与断裂,问题与语境,以求呈现更加丰富、更加真切的思想图景。为此,我们达成几点共识:

(1) 我们的研究首先基于对欧洲传播研究以及相关理论的通盘了解,进而以重要议题为纲目,系统梳理和有机整合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与思想脉络。

(2) 由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和语境衍生了传播研究的不同议题,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与政治事件自然作为背景纳入我们的研究及行文。

(3) 对欧洲传播思想史的追溯,不必拘泥于“言必称希腊”的思路。本书主要时间跨度从“一战”之后延续至今,也就是说我们将欧洲传播思想的发生发展基本限定在20世纪以后的时段。因为,学科意义上的传播学于“二战”前后方在美国诞生和发展,并在“二战”后对欧洲学界产生影响。此外,“二战”前,德国的报刊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等思想也在欧美形成一定反响,对欧洲传播研究以及思想理论的兴起厥功至伟。

(4) 对欧洲传播思想史的把握,应与现代西方思想史相结合,其中的重要命题如现代性、民主制、共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欧洲传播学者。

(5) 由于语言与条件所限,本书更多讨论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传播思潮,同时兼及其他国家。同时必须强调,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彼此之间都存在诸多差异,不宜一概而论。

(6) 欧洲大陆不是铁板一块的学术孤岛,故需通盘考虑欧洲内部、欧洲与其他地域之间的思想碰撞与理论互动。

本书作者均为中国传播学界的新人,按照李彬教授的划分,属于中国大陆第四代传播学人(见清华版《大众传播学》序言)。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年代,身处面向世界的潮流,肩负民族复兴的伟业,故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体现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会通。

参与本书的作者及其撰述章节如下:

曹书乐:绪论,第一章第1节、第2节,第二章,第四章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第6节;李漫:第一章第4节;常江:第一章第3节,第六章第1节、第

2节、第3节；何威：第三章，第四章第6节；赵菁：第四章第5节，第七章第1节、第2节、第3节、第5节，第八章第1节、第2节、第3节；关琮严：第六章第4节、第5节；徐培喜：第五章，第七章第4节，第八章第3节、第4节；黄卫星：第九章。

他们大多曾经留学/访学海外不同国家/地区，对各自领域均有较为深厚的积累，为了本书搜集和阅读了大量一手文献。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无不尽其所能，利用海外求学机会，充分发掘一手文献。此外，因身处国内外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们也同海外学者就有关议题及其研究思路进行了专题讨论，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访谈，从而进一步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提升了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本书主要基于文献研究的方法，充分占有资料，深入研读思考，进而梳理、提炼、建构趋近历史实际的思想史脉络。具体说来，本书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欧洲传播研究概览”，对英国、法国、德国的传播研究分别进行了评述，同时对比了“传播学”与“媒体研究”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欧洲传播研究和美国传播学的差异，并追溯了本学科诞生之初欧美之间的思想关联。本章对欧美之间差异与联系的分析基于对早期英文文献的梳理，而这些文献较少为国内学界所关注。对英、法、德诸国传播研究的梳理，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关注重点和思路，其中一些认识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第二章“新闻自由与媒体规制”，呈现了不同于我们较为熟知的美国新闻自由历程的欧洲立法与实践过程，特别是自由的观念在欧洲的演化脉络、18世纪瑞典的立法以及目前欧洲对出版自由的各种探索等。

第三章“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重点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的认识以及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包括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批判、传播新科技反思、文化反抗等。

第四章“从文化研究到新受众研究”，发掘了战后英国社会变迁和成人教育这一有别于文学传统的学术源流，剖析了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传统、受众研究的新思路等。

第五章“媒体与民主”，将公共空间、民主以及欧洲最重要的广播体制——公共广播电视引入传播研究，突出了欧洲学界所关心的数字媒体与民主议题、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与民主议题等。

第六章“现代传播与文化身份”，探讨了身份认同、性别、种族、阶级等议题与媒体的关系。

第七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详尽分析了欧洲学界对这一议题的主要观

点,阐释了相关思潮与理论,如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汇流与混杂化、跨文化主义等。

第八章“媒体·现代性·社会发展”,这一思想议题的重要性在欧洲尤为显著。本章对有关现代性和发展传播学的思辨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欧洲的一些独有议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领的学术与媒体实践、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以及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等,展开了专精的论述与分析。

第九章“交往与对话”,通过梳理马克思-巴赫金-哈贝马斯一路的思路脉络,突出了欧洲传播思想史最重要的哲学背景与思想传统,也是传播研究较少涉及的重要领域。

当然,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与宏大叙事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也常令作者感到力所不逮,而对一些议题和学术思想的论述难免挂一漏万。尤其突出的是,欧洲传播思想史本身既非界限分明的学科或领域,又始终处于流变不居的演进状态,若想以一部专著勾画一劳永逸的学术版图无异于刻舟求剑。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今后的持续研究和不断完善。

# 第一章 欧洲传播研究概览

## 第 1 节 传播学、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

传播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三十载春秋。<sup>①</sup> 它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从美国舶来,结合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传统,并逐渐吸收欧陆各种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养分,如今已经颇具规模,羽翼日渐丰满。

审视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除了本土的新闻学传统,传播学在中国的形成和腾跃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施拉姆在其奠基之作中建构的传播学框架尤其影响深远。受早期译介的影响或曰路径依赖,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将针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研究统称为“传播学”,对应于美国学界的“Communication Research”。

近十年来,随着国人学术视野逐渐拓展,欧洲及北美的批判传播学视角、英国的文化理论与媒体理论、德国的政治哲学思考、法国的符号学思想、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后现代传播研究等,也渐次成为新的思想来源。当指称这一系列研究时,一般习惯性统称为“欧洲传播学”或“欧洲传播学研究”。

然而,这一看似简明扼要的指称,却颇有究诘和商榷的余地。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传播学”中“传播”二字的提出,反映出中国在学科建设初期所受的美国式传播研究的影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所指出的,“施拉姆的来访对中国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很长时间里,他所提出的传播学体系成为中国学者想象‘传播学’的主要参照”(刘海龙,2007)。刘海龙的研究还表明,虽然在早期引进过程中,批判学派的思想并未缺席,但中国学界最终还是一边倒地选择了施拉姆而非席勒,亦即选择了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而非以席勒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同时,如果说施拉姆代表着美国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主流传统,那么批判学者席勒则体现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追求。

---

<sup>①</sup> 2007 年岁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召开了“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的圆桌会议,引发学界对学科建设历史的回顾和对学科发展与未来的讨论。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可以一个口头语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提到国外研究现状时,习惯于说“欧美”如何如何,与之相比,我国如何如何。可是,实际上所谓欧美往往只涵盖美国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主流研究。这种对美国的重视与对欧洲的忽视,包括对欧美差异的忽视,以美国指代西方的习惯,也反映了欧洲学术传统在中国的缺失。事实上,有关欧洲的研究在中国传播学界远未得到足够重视。

其次,“学”的提法反映了我们将某一研究领域“拔高”为“学”的惯性思维,隐含着我们对相关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抽象化的期许。英文中,“学”所对应的词缀为“-ology”,如生理学(Physiology)、生物学(Biology)等。但在有关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英文学术文献中却鲜见“-ology”的踪影,更为常见的是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Studies 或 Media Research 等表述。

使用“-ology”这一后缀的 Mediology 的提法很少使用,姑且将其译为“媒介学”。在研究者目力所及的文献中,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曾经谈道,“媒介学”体现了将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之企图,而不仅是“媒介系统社会学”的另一种称谓(Debray, 1999)。著作等身的英国学者、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也在近年使用过“媒介学”。他曾提出,社会学中对媒介进行研究的学术路径,应该“从社会学转向媒介学”。

与传播和媒介有关的学科为了应对不同社会情景中的传播状况,本身也一直处于演化过程之中,拉什教授将其概括为四个阶段。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新闻研究(Journalism)。这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扮演大众媒介角色的是大众化报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电视取代报刊成为家家户户最常使用的媒介,并激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传播研究的重点由报刊研究转到电视研究。这一代研究者大多具有文学和艺术等学科背景,深受文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具有社会学背景。80年代后,随着学界的语言学转向,符号学(Semiotics)等学科渗透传播学研究领域,广义的媒介语言开始受到关注,并诞生出一批经典研究。2000年前后,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时代亦即U时代(Ubiquitous Time)到来,媒介环境又变成沉浸式的无所不在,传播方式都在发生剧烈改变,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此时的传播研究便走向了“媒介学”(Mediology)。

那么,为什么使用“媒介学”这一特定称谓,而非社会学视野中的媒介?在拉什教授看来,U时代的媒介已经拥有自身的特点和逻辑,这种逻辑不同于社会逻辑。他上溯了英国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两种研究姿态,认为一派以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一派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前者关心的是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认为

对媒介的研究需将媒介置入它所处的社会逻辑中,前提自然是认为媒介在社会框架的规律下运作。而后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空间将成为媒介空间,媒介自身及其特点将对社会历史文化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当电脑技术与媒介最终结合在一起时,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才真正出现,而威廉斯的论断也变成过去时的“曾经正确”(was right)。拉什教授认为,在数字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介空间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形态,并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如果说传统的社会规则要么是法治的(constitutional),要么是规范的(regulative),用以调节和制约人们的行为;那么在U时代的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媒介所构成的规则属于生成式的(generative),通过代码(code)不断生产意义,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sup>①</sup>

拉什教授通过对U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分析,提出“媒介学”的概念,意在强调无所不在的媒介本身对社会的重要形塑意义。因此,他的前沿研究围绕着生物媒体、基因媒体、媒介艺术及因特网而展开,也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需要说明的是,拉什教授的认识只能说是社会学发展到今日的一个分支潮流(minor current),虽然新锐,却未必代表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在各种英、法、德文文献中,“媒介学”一词都不是传播学界的通行语汇。

总之,约定俗成的“传播学”一词,不足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西方学界的相应研究,特别是包含英、法、德等国在内的欧洲研究;即使在欧洲大陆,各个国家也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特点与各自不同的方法论偏好,对本土的相关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称谓。所以,在我们习焉不察的“传播学”一词的基础上形成“欧洲传播学”的说法,并不恰当。

以下列举几国的例子进一步说明。

以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政策研究等为代表的英国传播研究,重点关注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中的媒体,偏重质化研究方法,一般被总称为媒体研究(Scannell,2007)，“传播研究”一词在此较少使用。由于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对媒体保持密切关注,并生产大量涉及媒体与传播的思想成果,因此英国此类研究的更全面称谓应该是“媒体与文化研究”。

法国的传播研究则更多冠以“信息传播科学”之名,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并重,近年来关注的两大话题分别是网络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王志杰,2001)。法国传播学者米涅教授在1995年发表出版的《传播思想》一书中曾提出,信息传播学

<sup>①</sup> 基于斯科特·拉什教授于2006年3月31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从社会学到媒介学:U时代的媒介研究》的讲座内容。



应该研究如下领域：(1) 传播技术的应用和信息与意义的产生之关系；(2) 社会对技术的干预；(3) 显现信息的文字形式和支配它们的概念；(4) 信息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维度及其与新信息传播载体之关系；(5) 调解过程中的变化(转引自陈卫星, 2001)。从中不难看出法国式研究与美国式研究的差异, 也不难看出法国式研究与同处欧洲的英国式研究之差异。

德国的传播研究直译为“传播科学”, 它具有报刊理论的传统, 目前主要关注传播学、大众传播和媒体研究等领域。人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 在德国属于哲学学科。德国传播学界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国情, 似乎达成一个共识, 即尽量保持与任何意识形态的距离, 因此, 将实证主义这一看起来价值中立的研究路径视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此外, 北欧国家芬兰因与苏联接壤, 同时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地缘相近, 形成了特殊的学术传统。据目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媒体与传播系任教的 Rantanen 教授描绘<sup>①</sup>, 芬兰的媒体与传播研究受到其他国家的极大影响。芬兰的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20至50年代, 芬兰高校院墙外已经出现新闻业的培训教育, 这一实践受到德国报刊理论新闻学的很大影响。60至70年代, 美国的传播研究开始传入芬兰。1963年, 学者 Raimo Vehmas 声称, 以前德国式的新闻实践已经过时, 应该追随施拉姆所代表的美国传播研究。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不少芬兰学者获得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赴美学习, 其中包括目前在欧洲学界享有盛誉的卡尔莱·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70年代后, 随着国际思潮的变迁, 与苏联为邻的芬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潮流既是对美国主流研究的一种反拨, 也得力于美国批判学者如赫伯特·席勒等人的学说。80年代早期, 英国的文化研究又传入芬兰, 芬兰学者相继从英国的学术传统中汲取思想养分, 从而既从英国的媒体研究中获得灵感, 又对英国的文化研究有所继承和发展。对芬兰学者而言, 英国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莱斯特学派、威斯敏斯特学派、格拉斯哥媒体研究小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以及吉登斯、费尔克劳、汤林森等学者。

目前, 芬兰高校借鉴英国的 RAE 科研评估体系, 即认为用母语在本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无足轻重的, 而须用英语在英美国家认可的所谓国际期刊上发声。因此, 大部分芬兰传播学者不得不改用英语(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芬兰人基本上都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发表论文, 其研究也同英国的研究接轨。由于撒切尔

<sup>①</sup> 下文关于芬兰的情况, 参见 Terhi Rantanen, “The Future of Nordic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End of Splendid Isolation?”, Nordicom Information, 2000, 22(2)。